

· 今日西方社会 ·

[德] 于尔根·罗特 著

繁荣的背后

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



繁荣的背后

——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

[德]于尔根·罗特 著

罗国文 晓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Jürgen Roth

Zeitbombe Armut

——**Soziale Wirklichkeit in der
Bundesrepublik**

Rasch und Röhring Verlag, Hamburg, 1985

根据汉堡拉施—勒林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丁 品

繁荣的背后

——**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

[德]于尔根·罗特 著 罗国文 晓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625 字数：141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012-0488-8/D·88 定价：3.10元

Book title

27

译者的话

本书于1985年在联邦德国出版，原名为《贫穷，定时炸弹——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现实》，现根据其内容改名为《繁荣的背后》。

作者主要通过大量引用联邦德国官方和有关社会组织发表的材料和数据，以及亲自深入贫穷阶层的耳闻目睹，来向读者揭示联邦德国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所存在的严重的贫穷和社会问题，具体描述了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贫病交加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悲凉处境，同时向当局敲响了警钟。因此，该书出版后一度引起强烈反响，至今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的另一面镜子。

从该书出版到现在的五六年期间，联邦德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和资本输出，每年都有巨额盈余。但是，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并没有使联邦德国的贫穷问题得到缓解。相反，由于科尔政府从1982年10月上台后坚持推行“向有产者倾斜”的经济政策和全面削减社会福利，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穷和社会问题更为严重。

首先，在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联邦德国的失业大军始终高达200多万人。许多青年人、缺乏技术培训的人和外籍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不仅生活拮据，心理和精神

上也受到严重创伤，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 第二，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每月可支配性收入不足500马克）以下的人越来越多。据联邦统计局的有关统计，1978年西德有51万多个家庭的90多万人靠领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1988年增加到92万多个家庭的160多万人，10年内增加80%。1990年10月23日德国工会联合会等组织公布，到两德统一时，西德地区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已近400万。而另一方面，从1979年到1989年，少数高收入者的净资产拥有量却由13600亿马克增至28000亿马克，如果在全国平均分配，每个家庭可得10万马克。难怪人们指出，德国的突出问题是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无家可归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据德国“支援无家可归者协会”和其他有关机构、组织的调查，到1990年12月，西德地区的各类无家可归者已逾百万。其中无任何生活基础的人从1975年6至8万增加到13万，有30万人住的是官方提供的福利性住房，20万人住在由旅馆、医院、教堂、学校提供的临时性住所，40万移民及正在申请避难的人被安置在旧兵营、空校舍或体育馆内。在柏林、汉堡、汉诺威、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大城市，无家可归者问题尤为严重。比如在人口不到170万的汉堡，无房产多达5万多人，近1万人住在紧急收容所，约2000人到处流浪。又如在人口仅50万、以“汉诺威博览会”和“公园城市”而著称的汉诺威，竟有1500人常年露宿街头、公园、车站。究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穷而付不起房租，而且穷人支付房租的费用平均占其收入的百分比要比富人高3倍多，前者占36—38%，后者仅占10—12%。鉴此，德国工会联合

会副主席乌尔苏娜·恩格伦-克费尔在1990年10月24日的一次讲话说：“在富裕的联邦共和国，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穷人。”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统一，这为整个德国的发展无疑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这种统一给德国公民带来的将主要是压力和负担，是更深的贫富鸿沟和更尖锐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东德的生活水平本来就低，人均收入大体只及西德的1/2，而统一后的物价又基本持平，结果是西边高收入低物价，东边则是低收入高物价。其次，由于两个德国完全是按原西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统一的，原东德的一切机制均被打碎，致使大批工人、职员和党政干部失去工作岗位。到1991年11月底，东德地区的全失业人数达105万，占该地区总就业人口的11.9%，另有150万人半失业。这些人的生活无疑得不到保障，而自然加入贫穷队伍。对西德地区居民来说，统一给他们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经济负担加重。统一之前，科尔政府一再保证不为统一增税，但为了给东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筹资，仍不得不向人民开刀。据估计，从1991年3月科尔政府公布增税方案起，西德地区平均每人每年要为统一多纳税2000马克，这对那些经济上本来就很拮据的人来说，无异于敲骨吸髓。

失业、无家可归、贫病交加和没有出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吸毒、犯罪道路。1990年西德地区的各种刑事犯罪案445.5万起，比1989年增加9.7万起，是1965年的2.5倍；各种毒品犯罪案10.4万起，吸毒者近9万名，均比头一年增加10%。在各种犯罪案中，暴力犯罪特别是针对外籍人的暴力行动急剧增加。目前在德国的外籍人有500多万，一般从事德国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累活，如清洁工、搬运工、修

路工、低级服务等。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备受仇视、排挤，经常遭辱骂、围攻、殴打，有人甚至用汽油弹、石块袭击他们，放火焚烧他们的临时住所，开枪打死打伤外籍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91年1至8月直接针对外籍人的暴力事件达400多起，其中220起发生在东德地区。外籍人在德国之所以成为遭袭击的主要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人认为，正是外籍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饭碗和住房，因此越来越用袭击外籍人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作者于尔根·罗特，1945年生于法兰克福，精通商业学，曾在一家大百货公司任总经理助理，60年代末到土耳其逗留过一年，而后当记者。罗特主要为一些报刊撰写反映联邦德国社会底层生活的文章，1974年出版名为《论联邦共和国的精神和物质贫困化》一书，由于反响强烈，曾连续三次再版。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其续篇，而译者对近些年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的贫穷和社会问题在上面所作的简介，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最新情况，以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从而更好地理解 and 坚持执行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疏漏、误谬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罗国文

1991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引语——政界、舆论界和当事人的声音	7
房荒、失业、无家可归——从雷根斯堡到明登的状况	11
住房短缺的原因与后果——引自统计普查和经验调查	33
什么叫贫穷？	42
“基督博爱”与贫穷	48
同穷人一起生活——与伍帕塔尔无家可归者 聚居地的弗朗西斯派修道士的谈话	52
酗酒和贫穷恶性循环	66
富裕酗酒的说法	72
在工作岗位上酗酒	78
失业及其心理后果	88
1984年的社会政策	93
他们劝人喝水，但自己喝酒——联邦共和国 社会福利的减少	107
生活标准线下的贫困化	111
社会救济“加重”预算负担	121
社会福利的削减——以法兰克福为例	126

曼海姆市“社会寄生虫”的生活·····	131
来自“边缘地区”的启示·····	137
同贫民窟居民的谈话·····	141
向有产者倾斜的政策·····	145
从工厂的日常生活看物质和社会福利的减少·····	151
常见性贫穷——失业·····	162
失业造成的贫穷——以法兰克福为例·····	168
科隆的新贫穷·····	173
“基层教会自治委员会”的表态——失业 与经济制度·····	183
以联邦共和国的外籍工为例看对穷人的压制·····	186
后记：贫穷造成的政治影响·····	199

前 言

“人应当生来就是企业家”，满头黑发的斯图加特市那位基民盟议员聊天说。她坐在哈勒格特宫的壁炉旁，正同几个企业家一起闲聊。“如果人们今天还说什么社会在恶化，那不过是装腔作势，拼命干的人是会干出一番事业的”，来自吕内堡的一位企业家这样说，其他人点点头，表示同意。而后他们大谈第二天可以干什么：一些人去网球场，另一些人准备外出郊游。

我坐在旁边一言未发。我不是第一次问自己，对这类“认识”作出反应究竟有何意义？人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讨论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

那么，我自己又有什么权利来为联邦共和国社会上那些变得穷极潦倒的人辩护呢？我充其量只能从脑力上为那些生活在贫穷之中的人作点事。至于社会阶层，那么我更多地属于那些有足够的钱花销、生活舒适的阶层。

坐在慕尼黑“舍拉通”饭店的酒吧间，我当然可以轻轻松松地去悲叹哈森堡贫民窟的居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and 人道问题。可以说，我的被窝总是暖和的，服务和膳食也很好——一天的房钱足够一个领社会救济金的人维持14天生活。

因此，对我来说，研究联邦共和国的贫穷问题真是极其矛盾的大胆妄为。而更为矛盾的还在于我自诩了解那些晚上到医院为穷人开设的餐厅去就餐的人和拾破烂的人的状况。我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每当我看见在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竟有完全依靠这个社会的垃圾过日子的人，我就气愤至极。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我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同情？还是寄希望于改变社会？或者这些穷人仅仅是我的写作对象，使我能从中得到这些穷人永远也达不到的收入？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穷人居住区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正是这个社会的焦点，警察、施诊医生^①和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竞相来到这里，争先恐后地叩门入室。此外，人们主观想像中的贫民生活的旧俗恶习，有时也诱使一些名声不坏的组织派人进入这个下等阶层的危险世界。除了想写小说的作家外，正统的学术界的代表也常到这里东奔西跑，比如人种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有时还有心理学家。正是由于这些职业团体，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们的工作，穷人们的生活情况才并非完全不为人知晓，即便公诸于众的这些看法和消息的可靠性有一定限度。

我们大家都在鸟瞰这一切。如果有些看法令人感到压抑、严重困扰着我们这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那我们毕竟还有可靠的财经收入和相应的文化知识作后盾。任何一个认为应当对各种社会状况都进行描述的人，都会陷入这种窘境。

阿道夫·谢弗生活在凯撒斯劳滕。他多年来一直同6口

①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雇用的免费为贫民看病的医生。——译者

人一起住在3间小屋里。淋浴依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他说：“我们的要求不高。”生活在“绿色角落”的一名男子的年轻妻子，也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她说：“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后来给我丈夫发了季节补贴^①，实际上钱还是少多了。于是我们拖欠了房租。市政府告诉说，他们给我提供什么，我就得要什么。”

他们给她提供了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要安顿两个人。市政府为改变不人道的居住条件，在凯撒斯劳滕贫民区虽然作的事不多，但房地产局还总是在每幢楼里张贴广告说：“此处禁止存放自行车、儿童车、行李车，禁止在过道、电梯、地下室和前厅放置任何东西，违者请予告发。房地产局。”

8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常常要住两三人，没有淋浴设备和盥洗室。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住在凯撒斯劳滕的“绿色角落”，或是住在其他任何类似贫民窟这种住房里的人，都日益感到失望，无能为力。瓦尔特·舍尔是一位钳工，他说：“我妻子需在医院治疗，但她不想走，因为，否则她的孩子就得上儿童教养院。我为修缮住房虽然搞到了材料，但我怎么给修缮工付工钱呢？”由于收入不足以维持必要的生活开支，所以使用童工的现象并不少见。许多父母把学龄儿童送到郊区替农民干活，每周挣50马克，还必须交给家里。中午，总有一辆大众牌轿车开到居民区，8至10岁的孩子都背着口袋从家里跑出来，争着上车。他们去收获土豆。他们的学习情况是：最多中学毕业，绝大多数孩子则是去上特别学校^②。

① 原文“恶劣天气费”，指给因天气不好（如冬季）无法出工而扣发工资的人（如建筑工）提供的补贴。——译者

② 在联邦德国指为残疾、弱智儿童设立的一些专门学校，如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译者

我应当怎样来消化这些感受呢？晚上我还是回到我的旅馆去。

各种各样的矛盾决定着怎样对社会性的贫穷，特别是对政治领域的贫穷进行描述。目前，在有些部门人们总是十分生气地谈论“新贫穷”问题。反对党社民党和工会把“新贫穷”作为斗争概念，用以反对目前执政的保守派。没有任何人否认社会福利方面的基础设施已被削减。用于掩饰社会危机的社会福利费或其他公共资助措施，也都被波恩执政的保守派大规模收回。

早在社民党/自民党执政时期，就已把对生活费经常性项目的资助的提高，即把社会救济金的提高，限制为3%。而在资助生活费范围内，又把额外的补贴由30%减少到20%。越来越多的市镇还转而采取让他们服劳役的刁难和报复手段，以恫吓那些有权要求提供社会救济金的人。

为此，目前有人建议对旧的价值进行反思。哪里的“家庭、邻里或地区性社团得到维护和支持”，家庭部长盖斯勒就试图在哪里强调“提供救济金的道义义务”，以重新唤起“尚未被利用的潜力”。

但什么是“新的”贫穷呢？在社民党/自民党当政时，当时的反对党基民盟关于贫穷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声明，都被当作宣传手腕而统统拒绝，因为，社会和平据说正是在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时得到保障的。甚至工会当时也不愿研究“贫穷”问题，所以，如果把这说成是一种群众性现象，似乎也是很不当的。

那么现在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难道贫困是联邦德国社

会上的新鲜事，或者仅仅是贫困化的过程加快了？谁给贫穷下定义？难道是那些被排除在享有这个社会所提供的一切之外的人吗？或者甚至是那些自以为根据对收入的统计就可以精确掌握贫穷问题的政治家？谁询问过那些因环境污染而患病致残的人是靠什么生活？或甘冒比那些生活在所谓梅塞德斯^①区的人要早死许多年的风险的人，又是靠什么生活？

卡尔·雷茨拉夫在他的童年回忆录中描写到一个重要情况：“我所学到的是，教育就是美的含义、就是文明，而且它就像人的性格，是要后天获得的。前提条件当然是消除贫穷，以及有时间进行思考。只要参与到社会生活，亦即政治生活中去，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

今天，情况并无多少变化。从对萨尔茨堡工人协会17万工人的健康状况进行的一次调查得知，被询问者中有1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空虚的，没有意义，没有继续活着的价值，17%的女工表达了同样看法。迄今，这类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人予以考虑。外国人的生活情况同样无人过问。我问自己，在我们这里对许许多多——数字上介于100万到150万之间——的外国家庭的困境视而不见，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知道他们在从事什么样的摧毁着健康的劳动。我们也略知一些关于儿童和青年失去成长机遇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讨论贫穷问题时都很少受到重视。以生活在法兰克福市的一位南斯拉夫老太太为例，她已67岁，在联邦共和国干了20年活。她的养老金为每月350马克，就是说，她得依赖社会救济。她经过再三考虑才去社会

^① 指奔驰汽车公司最有名的高级小轿车梅塞德斯的生产和生活区，位于斯图加特市郊。——译者

局申请。可是移民局从她的申请表中获悉，这位南斯拉夫老太太应予驱逐。

那么，对此她能说些什么呢？她说：“后来我根本就没有领到社会救济，于是我不顾67岁高龄而继续劳动。尽管我生了重病，仍然想以某种方式打黑工。”

贫穷：凡是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总是担心房约被解除、法警来敲门的人，以及听凭周围世界各种丑恶现象侮辱的人，都总是处于失望和绝望之中，从而不可能参与社会生活。于是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另寻出路，比如酗酒。

“工人下班后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尽，困倦不堪，……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辛苦劳动，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由于身体不健康而产生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生活条件和生存没有保障，由于摆脱不了各种偶然事件，以及无力为自己的处境作点什么事，这些都发展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

这是恩格斯1845年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的描述。如果有人说，这对千百万联邦德国公民来说并不是今天的现实，那他是在撒谎。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本书或许真可以作出点什么贡献：公开揭示矛盾，从这些矛盾中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产生或许消除贫困的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我知道，在一套暖气供应很好、很宽敞的起居室里，当家里的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不会担心社会福利下降时，说话和写作也都是比较轻松的……

引语——政界、舆论界 和当事人的声音

“内政上的变化或许看得更清楚。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对福利国家的共同性的病毒无情地强行进行了一次消毒疗法。其结果很值得注意：不仅选民一再表示拥护，而且工人也明显表现出不愿意罢工和加入工会。”

这一见解可能直接来自以公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试验室。对此，迪特·施托尔泽曾予以解释。他任过《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之一，而在此之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曾于1982年任命他为政府发言人。今天，施托尔泽“仅仅”还是联邦总理的顾问，在《彩色画报》的“金色的90年代”栏目下，他经常发表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长篇大论。

生活在凯撒斯劳滕市的古斯塔夫·柯尼希一家却看不到金色的90年代。1984年这一家正生活在贫穷之中，他说：“我同三个孩子住在这里，当局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住房。到现在我们已在这里住了三年。没有淋浴，一切都很拥挤。楼梯也是一个问题，我和我女儿都走路不方便。我们很想要一套这样的住房，不高过二楼，厕所也在屋里。但当局表示拒绝。三个孩子分别是一岁半、四岁和五岁，都睡在一间小屋里。他们经常感冒，患支气管炎。”这也并不奇怪。整个房

子都很潮湿，随处都可以闻到霉菌味。冬天，糊墙纸从墙上脱落，即便窗子整天关着，也无济于事，湿气透过薄薄的墙壁直侵入屋内。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是助理工，月薪1300马克，一旦没活做就会被解雇，直到又有人雇用为止。劳资合同——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人关心它的。这些都是我从他的同事们那儿听说的。

K·沃尔茨在巴登—符滕堡的赖顿巴赫拥有一个塑料和五金制品厂。在他的企业里有45名雇员工作。沃尔茨生于1922年，自称是坚定的希特勒青年联盟领导人。“星期天我还得自己打扫院子，整理房间，洗涮衣物，务必保持清洁！然而现在都成了社会寄生虫——要是有人想工作，显然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找到工作。当然，现在是让左派停止其恶劣活动的时候了。要是企业工会委员进入我的房间，我就会马上关掉这个企业。过去报刊上进行过这类“论述”：“但我们也知道，显然这已形成了一个福利网，而这个网只有在经济增长时以及在风调雨顺时才有效，出现严重衰退时则无效。不管工人代表还是其他利益集团代表，对此表示理解还是不理解，也不管波恩联邦政府是由社民党继续执政还是由基民党领导，我们每个公民，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作好政府要削减所谓福利的准备。我们都应当学会放弃一点什么，不管我们是官员还是雇员，是失业者还是病夫，是大学生、学生、战争受害者还是残废人。甚至对母亲们来说，也要做好准备，放弃某些福利，比如说，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婴儿年了。但我认为，这里也蕴藏着一种机遇。这就是，一个人应该自己负责，用自己从上幼儿园到生命垂危时作出的贡献来参与决定自己的生命的历程，为此，也会从国家重新获得一部分自由。”这是一位名叫冯·